

## 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研究

刘浩<sup>1\*</sup> 樊杰<sup>1</sup>

(1.宁夏师范大学,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要:** 英语教科书是课程实施和英语教学的物质载体, 是英语学科发展水平的真实体现, 是实现英语学科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民国时期, 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 我国初中英语教科书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原版教科书的引进、学堂自编教科书的发起、统编教科书的出现以及民间自编教科书的繁荣发展过程。本文采取系统分析与重点深入的研究思路, 采用纵向分析的研究视角, 对民国时期的初中英语教科书作梳理、分析、对比与总结, 以及为当代我国的初中英语教科书改革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初中教育; 英语教科书; 历史演变

DOI: doi.org/10.70693/202607181701

##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English Textbooks for Junior Middle School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u Hao<sup>1\*</sup>, Fan Jie<sup>1</sup>

*1 Ning Xia Normal University, Gu yuan, Ningxia 756000, China*

**Abstract:** English textbooks serve as the material medium for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English instruction; they are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in the English discipline and a fundamental means of achieving the discipline's educational objectiv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gainst a backdrop of social turmoi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in China underwent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beginni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original-edition textbooks, followed by the initiation of textbooks compiled by individual schools,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ly standardized textbooks, and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privately compiled textbooks. This paper adopts a research approach combining systematic analysis with in-depth examination of key areas, employing vertical analysis to organize, analyze, compare, and summarize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reby providing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the reform of contemporary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in China.

**Keywords:** Republican period; Ju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English textbooks; Historical evolution

**作者简介:** 刘浩 (2001—),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 (英语)

樊杰 (2002—),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 (英语)

**通讯作者:** 刘浩

## 一、引言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文化日益融合,英语作为一门不同于汉语的“舶来品”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如何学好英语,如何运用英语也成了学者与大众日益关心的问题。而英语教科书作为英语语言教学的载体却被大家忽略,失去其应有的重视,“最不该忽视的文本,却最少被研究,最不该忽视的研究被忽视了。”<sup>[1]</sup>英语作为一门正规课程首次引入学校教育始于1862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此后,随之成立的方言学校及各类新式学堂也相继开设英语课程,此时的学校英语教学普遍仅依赖原版英语教材或传教士为教会学校编写的英语教材。直至1906年,我国自编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与其进阶版《华英进阶》,经过学部审定后才正式出版使用。<sup>[2]</sup>本文聚焦于民国时期中学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与其内在特征,旨在对民国时期的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嬗变作梳理总结,以及为当代我国的初中英语教科书改革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 二、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发展的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发展,主要受社会变革、人才需求及出版条件三方面驱动,学制与政策的演变主导其定位与形态,社会对实用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动其内容转型,而民间出版业的繁荣则为编写与普及提供了关键支撑。

### (一) 社会变革与教育政策导向

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动与学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共同构成了民国初中英语教科书发展的双轮驱动,初中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在国家统编与民间自编之间摇晃摆动,学制的不断调整,导致初中英语教科书的编写始终围绕学制进行,这些因素交织引导着初中英语教科书在统一性与多样性、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 1. 学制演变对英语学科的定位调整

民国时期学制的演变直接塑造了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发展轨迹。1912年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将英语列入初中必修科目,规定“每周3-4节英语课,侧重语法与阅读”。此时学制初建,英语教学缺乏统一标准,教科书编写仍处于混乱状态。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主要对“壬子癸丑学制”进行了改革,在教育阶段划分方面采用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考虑到青年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其次借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提出英语教学

应“注重实用”。<sup>[3]</sup>该学制允许民间编写教科书,极大地推动了英语教科书本土化的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颁布《战时教育纲领》,强调教育的“救国功能”,英语教科书要融入爱国主义内容与战时实用技能,这促使中央统编教科书成为主流。1946年战后恢复时期,教育部依旧延续使用《初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兼顾统一性与灵活性。允许核准的民间私编教科书与中央统编教科书并存,确立了二者并行发展的格局。

#### 2. 政治环境对教育的双重影响

民国时期国内政治动荡多变对英语教科书的编写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军阀混战时期,中央政府对教育的管控较为薄弱,地方学堂与民间出版机构拥有较大编撰自主权,从而推动了教科书的本土化与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时期,各族人民团结意识高涨,政府通过中央统编教科书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将英语教学与抗战救国紧密结合。战后,由于政局不稳定导致教育政策频繁调整,使英语教科书的发展一直呈现波动起伏的状况。

### (二) 英语教育的社会需求

民国时期随着国门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以及近代工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领域对英语专业人才都求贤若渴,据记载,1927至1936年间,全国各地外贸企业与外交机构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年均增长率直线上升。这一趋势直接推动英语教科书的发展转向“实用性”,内容覆盖也更加全面,增加外交谈判、书信写作和日常会话等课程发展学生的多元化思维,提升学生使用实用性技能的能力。

### (三) 教科书编写与出版的基础条件

民国时期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主要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迅速发展,成为英语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主力军,据统计表明,1923至1936年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了12种初中英语教科书,这些初中英语教科书占同类教科书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华书局出版了8种初中英语教科书占同类英语教科书的30%。这些民间出版机构拥有专业的英语教科书编写团队和完善的编印发行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初中英语教科书的编写质量。

## 三、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发展阶段

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并非线性进化,而是在社会动荡与教育变革的夹缝中生存,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 （一）第一阶段：原版引进与学堂自编起步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按照新制定的教育目标颁布了新的学制体系，史称“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表明在高小阶段，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时增设英语科目。这时新学制虽颁布，但本土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几乎一片空白。此时的中学英语教学，没有统一的大纲，不鼓励自编教材，主要以采用原版教科书为主，尤其是城市中条件较好的学校，普遍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直接进行教学。<sup>[4]</sup>这一时期主要引进的原版教科书有两类：一是来自英国的经典系列，例如《纳氏文法》，此书长期占据当时语法教学的主导地位；二是来自美国的经典读本。这些原版教科书其中的语言使用非常地道、教学体系严谨，但内容却完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且价格昂贵，其难度与编排方式并不完全契合中国初中生的认知规律与生活经验。这些原版教科书的广泛使用，一方面迅速奠定了中国近代英语语法教学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因全盘采用而导致的“水土不服”。与此同时，一些学堂自编教科书开始起步，以江苏师范学堂编写的《初中英语讲义》为例，该讲义结合当地教学实际，简化语法教学程序，增加了少量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汇与例句，但内容缺乏连贯性，编排较为粗糙不严谨，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教材体系。这一阶段被视为中国近代英语教科书发展的预备期，依赖原版教科书引进的同时，也刺激着国人自编教科书的需求。此时的初中英语教科书初步解决了民国初年英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为英语教育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基础保障。<sup>[5]</sup>原版英语教科书的引入，不仅向国内传递了系统的英语知识，也为后续国内自编教科书积累了经验。由于此阶段只是初中英语教科书发展的起步阶段，大量原版引进的教科书语言难度与学生发展水平严重失衡，难以满足中国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地方学堂自编教科书缺乏专业指导与规范，质量难以保证。这些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后续教科书编写不断向本土化、实用化方向转型。

### （二）第二阶段：民间自编教科书繁荣

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这成为民国初中英语教科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壬戌学制”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理念，强调教育与生活经验的联系，规定英语课程“应注重实用性，使学生

能运用英语应对日常生活的需要，其次在“壬戌学制”中，英语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英语学分在初中的教学分量中居首位。<sup>[6]</sup>除此之外，学制还鼓励民间出版机构编写教科书，此举打破了官方对教科书编写的垄断，形成了“审定制度下的民间编写”的格局。由于这一时期民族工业迅速发展，社会对实用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激增，这也为民间自编教科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各个民间出版机构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英语教科书编写的创新活力。例如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逐渐成为英语教科书编写的核心力量，它们组建专业的编写团队，根据壬戌学制的具体要求，结合中国初中学生的生活经验与学习习惯，以此编写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英语教科书。<sup>[7]</sup>这时的英语教科书内容贴近日常生活，编排上兼顾语法知识与口语技能，形式上更加有吸引力，增加了插图、练习、注释等辅助内容，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由林语堂等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就是此时期较为流行的英语教科书。<sup>[8]</sup>这一时期实现了民国初中英语教科书从“原版引进”到“民间自编”的关键转型，内容本土化与实用化探索取得初步成效。因此时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导致部分小型出版机构为抢占市场，编写的教科书质量存在内容粗糙与语法错误等问题，使市场上教科书质量良莠不齐。同时，部分教科书过度强调实用性发展，忽视了人文素养的培养，教科书内容缺乏思想深度与文化内涵。

### （三）第三阶段：统编教科书的出现与战时调整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导致教育事业也面临严峻挑战。为适应战时救国需要，国民政府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战时教育尤为重要”的方针，认为战时教育应以壮大抗战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为最终目的，提出要加强教育的统一管理。<sup>[9]</sup>随后在1938年颁布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规定：“各级学校教科书应一律由教育部统一编纂或审定”，旨在通过统一教科书，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战时实用军事技能。此外，由于抗战时期交通阻断不便、各类物资匮乏，导致民间出版机构的编写与发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难以满足全国学校的教学需求，这也为政府统编英语教科书创造了特定条件。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内容呈现出明显的战时特色，增加了战时实用技能的相关课程，如军事术语、战地救护英语以及

国际通讯对话等军事技能,去适应战时的社会需求;此外,英语教科书的内容涵盖大量的爱国元素,通过介绍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讲述抗日英雄事迹来呼吁民族觉醒,不断地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与家国情怀。英语教科书的内容编排简化了之前比较复杂的语法点,着重体现英语教科书的实用性与速成性,更好地适应战时教学环境的特殊情况。1939年由教育部审定出版的《战时初中英语教科书》是这一时期的重点教材,以陈鹤琴为主进行编制,他的编撰团队包括英语教育专家、一线英语教师与各类军事专家等。该教科书的核心理念是以“救国实用”主线,其中聚焦各种战时必需技能。抗日战争时期统编英语教科书的出版,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学生的家国意识与爱国精神,帮助学生树立抗战救国的坚定信念,凝聚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力量。这一时期的英语教科书过于强调抗战时期的特殊需求,导致英语教科书内容出现明显的单一化和政治化倾向,忽视了英语教科书发展的内在规律;抗战时期统编英语教科书不能完全适应不同地区的英语教学实际情况,导致英语教科书的获取与使用存在许多现实困难。

#### (四) 第四阶段:民间编纂的繁荣与多元化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进入了战后恢复与重建时期,此时的教育事业逐步回归常态化。国民政府根据现阶段发展调整了教育政策,逐渐放宽了对民间出版机构的限制,大力鼓励民间编写英语教科书,用来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多元英语教学需求。一方面,政府仍然保留了部分战时统编教科书的核心内容,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及基础英语知识部分,继续发挥其规范英语教学的作用;另一方面,民间出版机构重新迸发活力,在依据教育部审定标准的基础上,不断编写具有创新性与针对性的英文教科书用来弥补统编教科书的不足。此时的新形势对解放区教育的要求有所提高,各解放区教科书的编撰出版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以满足教育变革的形势需求。<sup>[10]</sup>此时的各地英语教科书内容呈现出“实用化与人文性并重”的特点:既保留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实用内容,又融入中西方文化经典与人文精神,教科书编排上依旧兼顾知识系统性与教学灵活性,部分地区教科书采用模块化设计,允许教师根据各地教学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商务印书馆1947年修订出版的《新学制英语教科书(战后修订版)》就是民间自编教科书的典型代表,该书

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战后重建”与“国际合作”等时代主题内容,补充了西方先进科技与优秀文化知识,同时还保留了本土化的传统文化元素。随后同年教育部开始修正中学课程标准,于1948年12月正式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其次在1948年颁布的《初中英语补充教科书》则体现了统编与民间编写的融合,允许学校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使用教科书。<sup>[11]</sup>这一阶段的初中英语教科书实现了国家统编与民间自编的优势互补,既保证了英语教学的规范性与统一性,同时又兼顾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多元需求,其内容编排更加成熟完善。但由于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加之内战爆发后,国家教育经费短缺、社会秩序混乱,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此时英语教科书的发展呈现出不充分、不稳定的特征<sup>[12]</sup>。

#### 四、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启示

纵观民国初中英语教科书三十余年的发展,主要是由国家意志、市场力量与教育者理想三者博弈与平衡的产物。最终未能定型成熟,根本在于民国政权缺乏稳定统一的宏观环境。据此,为当代的初中英语教科书改革提供一些历史借鉴与启示。

当代的初中英语教科书在内容定位上,应取缔“工具性”一家独大的局面,主动寻求语言技能、文化认知与价值引导三者的有机融合。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发展演变提示我们,单纯的进行工具性语言训练或者是生硬的价值灌输都不可取也不适用于学生的发展需求。当代初中英语教科书编撰应更精巧化地设计主题内容,使学生在掌握运用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逐渐形成跨文化视野和理解能力,并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当代的初中英语教科书在编撰机制上,应探索“统”“放”有度的健康生态格局。民国时期的历史阶段表明,完全放任英语教科书编撰会导致其市场混乱与教科书水平参差不齐,过度统编教科书则会扼杀民间市场创新活力与本土化特色发展。当代初中英语教科书编撰应在国家统一课程标准和在教育教学质量底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英语专业相关机构、英语专家学者和一线英语教师的创造力与教学经验,鼓励多样化各具特色的初中英语教科书版本进行良性竞争,争取形成标准引领与多元发展的初中英语教科书体系。

当代的初中英语教科书在确定教育目标时,应将其语言功能从“交际工具”发展到“育人载体”的根本转向。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的编撰虽处萌芽阶段,但例如《开明英文读本》等初中英语教科书已显示出将语言作为思维表达的工具性特点。当代初中英语教科书改革发展,应该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不断发展,不仅要教会学生认识到英语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更应该使英语教科书成为学生拓展跨文化视野、学习科学人文知识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综合性媒介载体,真正地实现英语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有机融合。

## 五、结论

民国时期的初中英语教科书,是在内忧外患、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孕育生长并发展演变的。它从对西方英文教材的原版引进作为起步发展,走过了一条由教育者自发探索、到国家力量介入统编规范、最终在市场激烈竞争与英语专业的现实追求下开始绽放多元发展的演变道路。无论是从内容结构或是编写理念都无不深深的打上了时代变迁与政治需求的现实烙印。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经过发展演变遗留下来的历史结晶,是一份令人无限遐想的宝贵遗产。在当今中国持续深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与深化课程改革内容。回顾这段历史,其历史意义不只是在“慎终追远”,更在于“以史为鉴”。当今时代如何编写出一套既能扎实培养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又能启迪学生心智发展、价值取向以及培养学生跨文化视野的优秀初中英语教科书,那这段民国时期的历史经验与编撰教训,仍能为我们提供多元化的思想资源与实践镜鉴。

## 参考文献:

- [1]石鸥. 2007. 最不该忽视的研究——关于教科书研究的几点思考[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05): 5-9.
- [2]石玉. 2008. 我国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开端:《华英初阶》与《华英进阶》[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03): 35-37.
- [3]刘桂玲. 2010. 中国近代学制对中学培养目标的定位[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4 (02): 43-45+48.
- [4]柳华妮. 2011. 国内英语教材发展 150 年: 回顾与启示[J]. 山东外语教学, 32 (06): 61-66.
- [5]吴驰. 2012. 由“文”到“语”——清末民国中小学英语教科书之演变[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11 (03): 50-54.
- [6]李王侠. 2012. 民国时期英语教育历史考察[J]. 兰台世界, (25): 45-46.
- [7]龚玲芬, 叶峰. 2016. 近代商务印书馆英语教材出版发行回顾[J]. 出版广角, (12): 83-85.
- [8]鹿彬, 张楚. 2016. 民国初中英语教材编撰特点分析——以林语堂《开明英文读本》为例[J]. 名作欣赏, (18): 51-53+64.
- [9]苏林琴, 杨家榜. 2016. 抗日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J]. 高教探索, (09): 104-107+112.
- [10]吴洪成, 于明珠. 2018.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活动[J]. 南都学坛, 38 (03): 30-37.
- [11]田利芳. 200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
- [12]杨萍. 2014. 民国时期初中英语教科书研究[D]. 聊城大学.